

伽里马之死

—对《蝴蝶君》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读

胡仕薇

(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 650500)

摘要:《蝴蝶君》是以冷战背景下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位中国京剧旦角演员之间的间谍谜案为主线,以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的原型而创作的。剧中的殖民关系主要表现在性别关系上,从作为西方殖民者的代表—男性伽里马与东方被殖民者的代表—女性宋丽玲之间的博弈来看,性别关系的重构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要想彻底颠覆殖民关系必需先颠覆性别关系。

关键词:蝴蝶君;殖民关系;性别关系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58(2014)02-0064-02

The Death of Gallimard—Discuss on M. Butterf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Feminism

HU Shi-wei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M. Butterfly is a spy case between a French diplomat and an actress of Beijing opera, it is composed base on the famous opera Madam Butterfly. The colonial relationship in M. Butterfly is mainly gender relationship. From battle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colonizer—Gallimard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stern colonized—Song Liling, on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ecause of reconstructing the gender relationship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so if colonized people want to subvert colonial relationship radically, they should first subvert gende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M. Butterfly ; colonial relationship ; gender relationship

近几十年来,华裔作家的集体创作,使得美国“东方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华裔作家用英文书写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出版,犹如华人愤怒的呐喊声,打碎了西方自我陶醉、自我标榜的美梦。1988年黄哲伦以《蝴蝶君》一剧夺得了声誉卓著的托尼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华裔剧作家。此剧广受后殖民研究者的喜爱。比如:李道全通过对《蝴蝶君》中男性形象的解读,指出:“华人男性他者身份的结构,既有西方霸权文化干预的因素,也有华人男子主动模拟。华人男子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操控,而是积极采取模拟策略,艰难地实现身份的自我表述”^{[1][62]}。另外,陆薇用霍米·巴巴的“模拟、含混与杂糅”的概念解读《蝴蝶君》对歌剧《蝴蝶夫人》的模拟,“《蝴蝶君》从始至终都被放置到了《蝴蝶夫人》的叙事框架之中^{[2][93]}”。本文将在东方主义的基础上,引入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殖民关系和性别关系做深入的解读。此时,剧中主角伽里马和宋丽玲已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的代表。

一、殖民关系的颠覆

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对东方做了总结:东方是西方的“他者”,这就意味着东方的存在是西方形象、观念、个性和经验的鲜明对比。因此,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

系,西方妄图君临东方。而东方学就是西方用来统治、重构并保证西方对东方有绝对权力的霸权模式。赛义德总结了历史上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人们用许多词来表达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3][49]}。因此,传统的殖民关系是西方君临东方,作为殖民者的西方人对被殖民者东方人普遍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妄图去征服占有东方。

伽里马对东方的观点深受法国作家普希尼的名剧《蝴蝶夫人》的影响。《蝴蝶夫人》表面上是日本女子为了对美国军官的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但是实质上却影射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男女关系,实际上又是主宰与顺从的关系。由于这部剧,伽里马认为东方女性都如巧巧桑一样温顺、柔情、羞报、脆弱。“因忠贞而死亡/胜过活着/带着耻辱活着”^{[4][25]}这一句话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他渴望拥有一个蝴蝶夫人。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和朋友对东方抱有很明显的鄙视态度。当他对妻子提到宋丽玲的演出时,她直接问道“他们也有歌剧?他们用中文演唱吗?或者,也可能一用意大利语?”^{[4][19]}歌剧一直被认为是高雅的艺术,是属于西方的,因此,海尔佳的质疑是:落后的东方竟然也能表演西方的歌剧?整部剧中海尔佳从未赞美过东方,在她心中中国人不过是跳梁小

收稿日期:2014-01-22

作者简介:胡仕薇(1990—),女,云南省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丑,是衰老的象征(包括文明)。而伽里马的朋友马克不止一次的提到“我们是外国鬼子”,所以我们对中国人不要用礼貌,他的经典台词“他们(东方人)害怕我们,瑞内。他们,他们的女人害怕我们。他们的男人——他们的男人恨我们。”^{[4](25)}从他们三人的观点来看,他们都认为他们西方人是凌驾于东方人之上的,他们可以去占有、鄙视、支配东方人。

但是,实际上,伽里马本身只是一个懦弱的、不善于交际的男人,在他的生活中,他从未获得支配的地位。就连跟女性的相处中,女性也永远是强势的一方。他一直渴望去支配一切,所以当他才十二岁时,看到他叔叔房子上的艳女杂志(只要花费三四美元,就能弄到七八个女人)时,他的身体开始哆嗦,“不是因为性欲一不,是因为权利。放在这里的这些女人,足有一架之多——我想让她们干什么,她们就会干什么。”^{[4](10)}他认为巧巧桑是“理想的女子,她美丽又勇敢”^{[4](6)}能对他言听计从,就像针尖上的蝴蝶一样无法挣脱主人的束缚。正是针对他的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宋丽玲才能成功的潜入他身边进行间谍的任务。他们之间的博弈,以东方的胜利为终结。宋丽玲作为一个男人成功的扮演了一个完美的东方女性,践行了他的断言“只有男人知道如何扮演一个女人”^{[4](63)},他之所以能成功的扮演好伽里马心目中的完美东方女性,是因为他了解西方人的心理,他知道怎样与伽里马周旋能让伽里马对他(她)感兴趣,他了解伽里马会怎样追求他(她)等等。总之,他了解伽里马这个西方男人,这正是他成功的颠覆了殖民关系的基石。

这部剧颠覆了传统戏剧《蝴蝶夫人》的东方顺从于西方,西方征服东方的殖民模式。“黄哲伦的《蝴蝶君》文本,是给西方殖民主义者一个警示:对东方的幻想只能导致西方的最终失败”^{[5](17)}传统的观念认为:东方女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们顺从、温柔、乐于为爱献身;东方男人则愚昧、无能,只能听别人的摆布,但是宋丽玲以他雌雄莫辩的身份对这种东方主义观点进行了最彻底的颠覆。

二、性别关系的重构

《蝴蝶君》明确的表现了殖民关系和性别关系的交汇点。首先,性别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剧中的主角不断在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这部剧的剧名就给人一种含混不清的感觉——缩写字母 M,在法语里它既是“夫人”(Madam/Mademoiselle)的缩写,也是“先生”(Monsieur)的缩写。因此,从剧作名称就可以看出剧中人对性别身份的困惑。

正如,“伍尔夫在小说《奥兰多》中让奥兰多转换性别意义,不在于生理性别的改变,而是在于在这个二元文化主宰的社会里,她/他为了生存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竭力迎合社会对于男人或女人的期盼。在这个过程中,性别角色在不断地演变,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划分模式”^{[6](73)}。这部剧中,黄哲伦同样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划分模式。与奥兰多相似的,宋丽玲是为了迎合党的需要穿上女性的服装,为了迎合伽里马的喜好扮演一个脆弱、温顺的东方女子,骗取伽里马的信任和爱情。当他终于能以男性外貌面对伽里马时,他迷惑了:他究竟该何去何从?“我是你的蝴蝶。在这件长袍下面,在所有的东西的下面,始终是我……承认吧——你爱我”^{[4](88)}“那么——你从没有真正爱过我?只有当我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爱我?”^{[4](88)}在他(她)的身上,男性与女性的气质难以分辨,交融在了一起,既有女性的多情、温驯,又有男性的坚强与果敢。

同样的,伽里马的性别身份也很难界定,在剧末,他说道:“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更好……19年,在巴黎

郊区的一个监狱里。我终于找到了她。我的名字叫瑞内·伽里马——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4](63)}。就连宋丽玲都说:“我想你已经变成了更多的东西。更像……一个女人”^{[4](60)}。伽里马从开始就只是一个想要逃离西方强势女性的包围,得到一个温婉的东方女性的懦弱西方男性而已。为了彰显他的男性气质,他渴望一只蝴蝶,“她带着自己放在袖子褶皱里的所有财产,来到我们身边,把它们全部展示出来,任凭她的男人处置”^{[4](10)}。因此,宋丽玲才能用她的顺从、柔弱打动伽里马的心。宋丽玲的出现完美的让伽里马满足了他虚无的男性心理。妻子对他的压制使他更快地投向宋丽玲,比如:由于,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妻子就要求他去看医生,他对宋丽玲说到:“我是个现代的男人,蝴蝶。可是,我不想去。这是同样古老的符咒。如果我不能有个孩子,我会觉得上帝自己也在嘲笑我”^{[4](60)}。由此可见,他不愿意承认他作为一个男性的无能,只有在最后,当他的幻想被无情的打破时,他才认识到:他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是那个为了爱付出生命的蝴蝶夫人,他才是那只针尖上的蝴蝶。

在第三幕,当宋丽玲脱下他女性的外衣时,作为一个男性,他开始掌控逐渐丧失男性特征的伽里马。至此,两位主角的性别身份开始明确。特别是,当伽里马把刀插进自己身体后,“一束强烈的灯光照在宋丽玲身上,他作为一个男人站在那,看着死去的伽里马。他抽着烟……两个词从他嘴里传出来,蝴蝶?蝴蝶?”^{[4](63)}。这种性别身份的重构正好迎合了女性主义者对性别身份的观点,性别身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重构的。男女的性别身份难以界定,需要依托性别表征,而不是生理条件。

三、结语

一方面,伽里马之死就意味着西方认为能掌控东方这种观点的崩塌,颠覆了传统戏剧《蝴蝶夫人》中的东方顺从于西方,西方征服东方的殖民关系。黄哲伦以他的作品,打碎了西方自我陶醉、自我标榜的美梦。以此警示西方:如果沉溺于东方“顺从”的美梦,只会招致灭亡。另一方面,伽里马之死意味着女性不再是那个顺服的,软弱的,受压迫的一族,女性也可以冲破性别的界限,构建自己的性别身份,解构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生理性别分类。总之,《蝴蝶君》阐释了:要想彻底的颠覆东西方的殖民关系,必需先彻底颠覆男女的性别关系。

参考文献:

- [1]李道全.他者的游戏:《蝴蝶君》中的华人男性形象[J].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10(1):52-56.
- [2]陆薇.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后殖民解读[J].外国文学,2004(4):86-91.
- [3]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Hwang, Henry David. M. Butterfly[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89.
- [5]陈爱敏.“东方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华裔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2006(6):112-118.
- [6]吕洪灵.伍尔夫《海浪》中的性别与身份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5(5):72-79.
- [7]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